

“科幻”一词与两岸“默契”

□黄海



在缺少默契的情况下，大陆和台湾同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次科幻勃兴。科幻小说迅速崛起，而两岸几乎同时使用“科幻小说”这一名词，这个现象何以致之，是不约而同的巧合吗？这是值得学者深入挖掘研究的课题。从山西太原的“星云奖”大会回到台湾，我接到年轻的科幻小说作家飞航（贾立元）兄的函询，重新探索中文“科幻”名词的由来。

英语世界出现science fiction一词，以目前科幻文学界所熟知的史料，是雨果·詹斯贝克1926年在美国创办了全世界第一本科幻杂志，当时还没有science fiction一词，直到1929年才发明了scientifiction（“科学的小说”）一词，即是scientific和fiction两个词的合成，之后又改为science fiction。但根据爱德华·詹姆士的说法，可以追溯到1851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的书中首先倡导使用了science fiction一词，认为可以用科学故事取代过去的传奇浪漫故事，以启发教导儿童。这样说，科幻小说与儿童少年的关系，160多年前就被学者所洞见。科幻小说与儿童文学的不解之缘，源于科学想象的文学，有其童话性。想必1851年的scientific fiction一词，在英语世界早已不闻，考古才发掘得到的。

关于“科幻小说”一词在台湾的使用，在我的《台湾科幻文学薪火录1956-2005》一书开头已有介绍，仍有很多人问起，以下是我重新整理，将“科幻小说”一词在两岸的来历，并加上新见解补充清楚。

大陆本来就有“科学幻想”一词，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苏联文集包括贝利亚耶夫的作品已经用“科学幻想小说”的名词了。1956年6月苏联作家胡捷《论科学幻想小说读物》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至1962年间，中国大陆由于苏联的推荐，将俄文版《凡尔纳全

集》隆重出版。被誉为大陆科幻之父的郑文光（北京天文台研究员），1956年3月在《读书》杂志发表《谈谈科学幻想小说》（《郑文光七十寿辰纪念文集》）。

从时间上说，大陆首先使用“科学幻想小说”一词无疑义，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使用“科学文艺”或“科学小说”，大约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大陆科幻小说才出现勃兴。两岸直到1988年才有公开交流，在这之前几年则是非正式的接触。1988年我到大陆访问，北京已经出了《科幻海洋》四辑，叶冰如是责任编辑；还有另外三辑的科幻小说，定书名分别为《科学神话》，搜集了1976年到1981年大约6年的科幻小说，据主编饶志华的统计，光是1981年发表的科幻小说就有300多篇，是过去5年的总和。

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都在这一时期有“科学幻想小说”或“科学小说”的名词出现，更早之前，1956年至1958年旅居香港的作家赵滋藩由亚洲出版社出版了3本书《飞碟征空》《太空历险记》《月球上看地球》，封面都打上了“科学故事”的标题，这3本书其实都是科普教育书，讲述科学旅行故事。当时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大陆创造了300万册的销量，赵滋藩的每种书销售也都达到5000册，在当时的台湾，算是畅销书，可见与科普教育挂钩的书是有市场的。赵滋藩后来来到定居，热心科幻文学推广。如果追溯到1949年之前，1946年的台湾在日本占领时期就有叶月医学博士创作的《长生不老》日文小说出现，封面有“科学小说”字样。1949年后台湾实施中文教育，此书已淹没不闻，近年才被发现。

据飞航最新查考认为，1949年以后，大陆的“科学幻想”应该是受苏联概念的影响，之前部分可能受到了英语世界的传播。

台湾方面，“科幻”一词是张系国首先创用无疑。1968

年两部全球性的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浩劫余生》的上映，带来太空热潮与科幻气氛，张晓风1968年9月发表《潘渡娜》，同年10月张系国在《纯文学》发表了《超人列传》，1968年12月之后在《中华副刊》《作品》月刊等处发表系列科幻小说，都没有冠上任何文类名称。1969年12月出版的《一〇一〇一年》，是台湾最早的单行本科科幻小说，都没有贴上任何的标签。那时我没有读到张系国1969年10月在《纯文学》发表的《奔月之后——兼论科学幻想小说》那篇重要的经典大作，不知文中已多次提及“科学幻想小说”及“科幻小说”一词。倒是同一期间我在儿童杂志《王子》《模范少年》读到了日文版译介中文加上插图的与“科学幻想”相关的漫画和文章。

我的《新世纪之旅》1972年12月出版，这时期，我已从儿童杂志注意到“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名词，而在香港出版的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著《现代科学趣谈》中，也出现了“科学和科学幻想小说”。那时候，很多人都对《2001太空漫游》的神秘性结尾非常着迷，我希望能从书中得到答案，虽然没有找到，但还是很喜欢这本书。

虽然《纯文学》是专业的文学月刊，但台湾一般文化读书界，对科幻小说一词陌生，或许也无印象。到1975年，看到张系国出版的《让未来等等吧》杂文论集，才读到《奔月之后——兼论科学幻想小说》一文，出版此书的书评书目出版社在当时文化界极具影响力，我在1975年重新出版的《新世纪之旅》都只冠上“未来问题小说”，尚未使用“科幻小说”一词。

1976年3月，台湾的大出版社“时报文化”推出了王溢嘉翻译的美国的《最佳科幻小说选》一书，“科幻”一词正式以书名为主体上市，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也在当时极具分量的《中央日报》副刊发表《银河迷航记》，副标题是“科幻寓言小说”。张系国同年起也频频在当时台湾发行百万份的《联合报》副刊发表译介世界科幻短篇小说精选。所以说，在1976年的台湾重要报刊的标题已有“科幻”这个新名词，而“科学小说”这个偏向狭义的词，在台湾也渐渐少人使用。张系国1978年10月结束出版两年内在《联合报》发表的译作《海的死亡》，封面冠上“科幻小说精选”，而且又写了序言《科幻小说的再出发》，序文同样在《联合报》的副刊发表。张系国将科幻小说内划归4种：探险科幻小说、机关科幻小说、社会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四大类，这篇序文的意见和分量，对科幻概念的影响绝对重要。加上70年代中期《星际大战》（1977年）、《第三类接触》（1978年）等科幻电影推波助澜，以及电影公司的宣传，“科幻”一词遂广为传播。

总之，“科幻”一词在1976年的台湾已广为媒体使用，猜想或者由于《联合报》《中央日报》的影响力和台湾出版物的传播，大陆在“文革”结束之后，原有“科学幻想”一词，也缩写成“科幻”。台湾这边的“科幻”用语，或许有意无意成了大陆的参考。日本方面的用语是“科学小说”、“空想科学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的科幻小说也曾有偏向“SF”（科学）或“F”（幻想）之争。之后的“SF”小说，来自science fiction缩写，日本也称为“科幻小说”。

1988年我们全家到北京访问时，《人民文学》的何启治编审陪同我们到《人民日报》参观访问，在报社里就看到《联合报》放在编辑部的报架上，我刚好是《联合报》编辑，就拿着报纸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可见台湾这边的科幻文化传播影响大陆也是有可能的吧。更翔实以及深入的相互传播与交流，依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查考。



百礼馆记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张瑞田

2013年10月27日的上午，我们在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举行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墓地位于陵园人工河的河岸，靠河的地方，新建了“疾风迅雷亭”，亭的名字源于傅雷的号“疾风迅雷楼”。挺拔的立柱、流畅的线条、倔强的亭檐，分明就是傅雷与朱梅馥人格的化身。墓碑用红布覆盖，花圈围在墓穴的周围，我们拿着一枝玫瑰，等待傅雷与朱梅馥的到来。上午9时30分，傅聪与傅敏护送傅雷、朱梅馥的骨灰出现在墓地。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青年，撑一把伞，遮挡光芒。三个人走到墓穴旁的桌案前，把骨灰轻轻放在上面。

傅聪把父母的骨灰放下，眼睑低垂。他穿一件中式的黑色礼服，身材中等，头发花白，大耳垂轮，步履轻缓，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是一位典型的老人形象了。傅敏比哥哥显得年轻，他不离傅聪左右，照顾着哥哥的行动。与傅敏比较熟悉，他敏捷的思维、干练的举止、痛苦的回忆，让我多次领略到一位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悲伤。

1966年，我3岁。这一年，一位叫傅雷的先生和一位叫朱梅馥的女士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一个动荡的世界。两位优雅、高贵的中年人，以悲剧的形式离开了他们心爱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离开了他们典雅的译文、丰富的藏书，还有那么多温暖的书架。

3岁的我，当然不知道上海，也不会知道傅雷和朱梅馥，更不会知道长大成人后，会如此强烈地热爱傅雷，以及傅雷留下的译文、家书、手札、文章。对傅雷的每一次阅读，我都会想到1966年，这个狰狞的年份，为什么如此残酷地剥夺了傅雷与朱梅馥的生命。

终于能够独立思考了，我明白了1966年的颜色，这是亘古的黑暗，是人类的耻辱，是中国人长期的疼痛。这一年，离开我们的不仅仅是傅雷、朱梅馥，与他们一同走向不归路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那个时代，他们别无选择。

今年，傅雷105岁了，朱梅馥100岁了，如果他们活着，傅雷的趣味、朱梅馥的微笑，足以照亮我们的生活。事实是他们走了，他们的走，依旧让我内心不能安宁，依旧促使我思考某些尖锐的问题，依旧让我想念傅雷，直追导致傅雷、朱梅馥悲剧的根源。

眼前的傅聪已经是79岁的老人。他的身边有一位高个子中年人，无需多问，一定是傅凌霄了。这是傅雷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对这位长孙，傅雷非常惦念，他为这个孩子起名叫傅凌霄。

傅凌霄没有与伟大的祖父傅雷相拥而泣，今天，他看见祖父与祖母的骨灰一同回到属于他们的家，他低着头，心里一定很难过。我是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时，知道傅雷的。那时，我仅知道傅雷是翻译家，冤死于“文革”，后来，读《傅雷家书》，才知道傅雷和朱梅馥之死是多么的不应该，是国家之耻，是民族之殇。也是在这本书里，知道了傅雷上进的儿子傅聪。上世纪80年代，是启蒙的年代，是反思的年代，是学习的年代，我们把傅雷和傅聪视为精神的楷模。傅聪，多么英俊的青年啊，漆黑的眼睛、爽朗的笑容、潇洒的风度、横溢的才华，无疑是我们这一代的偶像。

也许是当了父亲的缘故，我的心开始向傅雷靠拢。对傅雷的阅读，已不限于他的译文和他著名的家书、随笔、书札、艺术评论，甚至他的墨迹，一并成为我精神世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纪念傅雷诞辰105周年、朱梅馥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说，傅雷是需要发现的，在研究中发现，在发现中研究，我们会看清傅雷真实的一生。持久、散漫地阅读，我看到作为翻译家的傅雷，还有一副传统的笔墨，用毛笔写文言，也是傅雷所长。如果说效率与直率、坦诚与天真的性格，是西方文学的养成，那么，优雅与敦厚、清高与决绝，一定是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质。最近的阅读，我们还发现，傅雷敢于为民请命，即使背负右派之名，仍然发出“勿先持有企业单位比一切都重要之成见”，为民权张目。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在墓地起伏，傅聪与傅敏把父母的骨灰放入墓穴，他们又把第一捧土撒在棺木上。鲜花覆盖了傅雷与朱梅馥另外一个家，他们心痛，他们安息。覆盖在墓碑上的红布揭开了，灰色的墓碑，有一行黑色的字迹，这是傅雷的手迹，书写着傅雷当年写给傅聪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我站在一旁，眼泪夺眶而出。没有理由，只有感受，没有条件，只有哀伤。是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即以不甘屈辱、不甘背叛、不甘堕落的方式，去创造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是一个无形的世界，是高洁的世界，是值得敬仰的世界，是让我们向往的世界。

伴随着傅雷喜欢的乐曲，傅敏代表家人，在父母的墓前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爸爸、妈妈，47年前，您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成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您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安息吧。

我一字字听着，听着傅敏发自内心的表白，傅敏是对父母所言，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所言。简短而振聋发聩，是我们灵魂的清醒剂。

乐曲萦绕，白云飘飘。我持着一枝殷红的玫瑰，走到傅雷、朱梅馥的墓前，我把玫瑰轻轻放到墓前，深深鞠躬。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我们同属一个世界。



适斋书话

戏台人生：名分杀人

□戴明贤

少年时看周信芳亲演的麒派名剧《斩经堂》影片，觉得恐怖极了，不明白吴汉为什么非要杀老婆。此后甚至每闻那凄厉的高拔子唱腔就有栗栗之感。后来此剧禁演多年，也就渐渐淡忘。几年前偶见此剧作为流派代表剧目资料，出了盒带，如见故人，立即买了一盒。心想以现在年纪，足以禁受情节的刺激，超然地欣赏那曾经家喻户晓的麒派唱腔了。谁知听了一遍，不仅儿时恐怖重新唤起，甚至更加难以接受，知道礼教杀人胜于斧钺，岂止是“不闻声”而已，简直可以让无辜者心甘情愿微笑受戮。

吴汉是王莽爱婿，镇守潼关。某日捉到了王莽的头号敌人刘秀，立了大功。正要上奏请赏，不料母亲出来干预，下了三条命令。一是立即放走刘秀；二是砍倒大旗，不做王莽的伪官。其原因，王莽正是他的杀父仇人。吴汉虽感意外，但事实很重大，是非很明白，立刻凛遵照办。吴母接着提出的第三项命令，却令吴汉如受雷殛了：她要儿子杀掉善良贤淑的媳妇王兰英。王兰英是王莽的女儿，吴母认为只有杀掉她才能让儿子死心踏地地扶汉反莽。吴汉知道妻子毫无过错，遑论定罪。他难以从命，吴母就指着他头顶三条大罪——国仇不雪、父仇不报、不遵母命，“死有余辜”，硬逼着儿子提剑去了经堂。王兰英闻讯魂飞魄散，据理力争。她的答辞是义正词严的：她身居深宫，不问政治，“国仇家仇问我父，杀我怎说报君恩？”虽是仇人之女，未犯七出之罪，何况“你我夫妻恩情深”。她恳求婆婆饶她一死，情愿削发为尼，了此残生。但怎么说也无济于事，最后体恤丈夫违抗不了母命，自己违抗不了夫命，自刎而死。吴汉至此心灰意冷，提出一不扶莽二不扶汉，只求侍奉母亲天年。吴母不愿儿子“耽误国家大事”，干脆自己也自尽了事，“成全这个奴才了罢！”

吴汉的父亲，是为给刘家争正统而与王莽抗争才被杀的；他的妻子，又用了两条人命去逼迫儿子扶汉反莽。名分高于一切，泯灭了是非、善恶、功过、伦理乃至生命，此为一例。所以儒家首重“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一正了，多么不公平、不合理、残酷惨烈、灭绝人性的事都可以冠冕堂皇地干了。

《儒林外史》写老秀才王冕鼓励女儿饿死殉夫，噩耗传来，做母亲的大哭不止，做父亲的仰天大笑曰：“死得好！死得好！”哭的是人性，笑的是礼教。旧时父母官断案，不论偷盗抢掠，奸情谋杀，总少不得要调查调查，问讯问讯；惟独父母告子媳的“忤逆”罪，可以不究详情，但凭做父母的一席指控，便可当堂杖毙。因为名分摆在那儿，其他便可从略。所以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说。父母如此尊贵，父母之上的君主就不言而喻了，所以“犯上”是万罪中的头一条大罪，诗文言词中有“大不敬”就要掉脑袋。反之，“以身替上”则必然是最大美德。杨大郎替宋王死，莫成替王死都成为“留下那美名儿万古传扬”的英雄烈士，同是人命，名分不同则价值不同。

但更多的死是属于女人的，因为她们不仅与男人一起有君、父、主子在上，又多了两样自己独有的名分：丈夫和贞操。于是以身相殉的机会也就多了许多。《警世通言》里的蔡瑞虹，忍辱报仇，手刃杀父仇人之后，仍得自刎而死。因为她失了身，而失了身是比去命更大的事，纵然是出于策略需要，也不准将功补过的。《红楼梦》里鸳鸯不从贾赦，而后碰死在贾母灵前，从抗主（贾赦）变成了殉主（贾母），是深通礼教的选择。吴汉的妻子和母亲只是这牺牲大军中的两名而已。这个至高至坚、铁塔一样的名分或礼教是哪儿来的呢？人订的。男人们订的。统治亿万奴民的男人们订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订的。曼特弩《蛇与塔》自序指出：“妇女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虐待、轻视、玩弄便到了哪里。对妇女实施种种行为的，甚至是妇女自己。”巴金《激流三部曲》洋洋百万言，抨击的就是礼教二字，但进而揭示礼教不仅是对妇女的残害，而且是对未来的扼杀。说到底礼教是统治的需要。

钱锺书先生说得透彻：“人欲、私欲可以杀身杀人，统纪而阐之，以为‘天理’、‘公理’，准四海而垂百世，则可以杀天下之后世矣。”而且这种“理”经过千百年不遗余力的弘阐，进入骨髓，驻于人心，使无数人带着微笑去为这种“欲”之“理”而受死，比如吴汉的母亲。这种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足以惊心动魄。



秦天柱作品

2013年年初以来，已经有近80种杂志消失。按照专业规范话语，应该是停刊、休刊或终刊了。我注意到，在网络或平面媒体上，常常可见关于杂志开办或经营方面的新闻，也不断有人爆料或评说。可就这“消失”的几十种杂志中只有一小部分通过各种媒介公布了正式的消息，大多数杂志并没有正式消息就不再上市上摊或上架了。我以为，这大约是杂志社不知如何向世人公布自己的命运，因为它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做过调查，“消失”的杂志比公开的数字还要更多。有的月刊杂志到8月份就没再出版，有的双月刊已经6个月不再面市了，有的双周刊连续4个月不再出版。我曾问过报摊摊主，回答令人失望；我也在淘宝和天猫商城搜索过，却发现并不全面。有的杂志虽然暂时停刊了，但还在网站出售编辑签名本，或将几期装订成册出售，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杂志社对经年累月所做产品的“临终关怀”；而有些6月份停刊的杂志至今还在报摊上顶着寒风等待读者的最后光顾。杂志没了，发行人员也风流云散了，这些杂志就成了没有人过问的“流浪刊”。

“消失”的刊物不少，新创刊的杂志却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百种。以各种名头正常出刊的杂志层出不穷，

杂志杂象

□李玉瑶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我在网上发现了很多新近创刊、试刊的杂志（或读物），买来后才发现该刊物没有刊号 and 版权页说明，但写了是创刊号，也有指导机构、顾问。主办方事先说明该杂志不上市，读者付钱就给快递一本，你情我愿，整个过程并无欺诈行为，可探究起来却并不规范，我给这类读物命名为“疑似刊”。

再说“大事件刊”，这类刊物在几年前曾有过，因为近年来震动内外的事件层出不穷，每逢有事件发生，就会出现大批杂志来做相关解读。但今年来看，这类杂志数量有所下降，是办杂志人的兴趣减弱，或读者不再买账，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这类杂志并不好做，也难以持久，办刊激情也并不常有，更主要的是，刊物内容上

赶不上变化发展的社会，充其量也只能在一定时期记载世界上千姿百态的事件。从长远来看，或许留给后人去梳理研究更好。

作为外国文学杂志、图书的编辑，我在工作中也曾经历了多起版权上的纠纷，尽管最后处理圆满，但仍不免对这类事情时时关注，以提醒自己免犯错误。

写作、翻译凝结了作者和译者的心血和才华，他们的著作权值得尊重。另外，严肃办刊也要守规矩。曾有一家文摘杂志说获得了海外几大知名媒体的授权，指定在此刊登一篇文章，但外媒上却并没有写明供其他杂志使用的字样或标识。无独有偶，今年又有一家号称发行几千万的杂志声称每个月要给某著名海外杂志支付刊登文章的费用，但了解办刊常识的人知道，国内外著名媒体都很爱惜名声，不会轻易给没有版权版权顾问和版权编辑的杂志授权的。

要给2013年的杂志现象做个总结并不容易，我在杂志社工作多年，故而对于此较为关注和敏感，杂志的管理发行等工作极为琐碎，但又不得不循规蹈矩，归根结底还归到那句“做事守规矩”上去。中国的杂志最初创办于1815年，眼看快200年了，我衷心希望杂志的创办并不只能以“杂”来概括。